

家庭治理数字化的积极经验与升级路径

——以杭州市为例

编者按

由于婚姻家庭矛盾纠纷原因复杂,且信息涉及多个部门,数据共享和治理合力的形成难度较大。如何运用数字化手段开发适合家庭治理的应用场景,值得深入探索。本研究通过走访杭州市各级各地妇联与其他相关组织机构,了解杭州市运用数字化推进家庭治理的现状和积极经验,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了家庭治理数字化需破解的三大难题,并对家庭治理数字化迭代升级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思考。

徐士青

反家暴是家庭治理的突破口和制度重塑的关键点。而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原因复杂多元,矛盾纠纷信息涉及多个部门,数据共享和治理合力的形成难度较大。因此,如何运用数字化的手段开发适合家庭治理的应用场景值得深入探索。本研究通过走访杭州市各级各地妇联、服务于女性和家庭的基层组织、各级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等机构,了解杭州市运用数字化技术和手段推进家庭治理的现状和积极经验。在此基础上,笔者归纳出了家庭治理数字化需要破解的三大难题,并对家庭治理数字化迭代升级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思考。

家庭治理数字化的经验

家庭治理数字化指运用多种信息技术对反家暴数据进行整合,使反家暴工作实现基于数据要素的协同与合作,基于数据资源的决策与服务,提高治理的科学化和智能化。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要求。在此背景下,杭州市妇联按照浙江省妇联相关工作部署,基于已有的“数智群团”工作格局,积极推进家庭治理数字化,进行了一系列有效的实践探索。

2021年5月,杭州市妇联数字驾驶舱在城市大脑正式上线,并接入杭州市“数智群团”系统。该驾驶舱与公安、人社、民政等部门进行数据协同共享,实现全市涉家暴警情数、女性人数等多个数据实时动态展示,初步构建了妇联工作运行新体系。同时,包括萧山区妇联“安心驿站”、富阳区妇联“家和智联”、西湖区妇联“家和帮”、建德市妇联“伊码办”微信小程序、高新区

(滨江)妇联“一码解家事”掌上应用平台等在内的第一批应用场景被开发出来。而作为在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平台——浙江ODR平台集在线咨询、在线评估、在线调解、在线仲裁、在线诉讼五大功能于一体,管理员、调解员以及当事人均可线上开展工作,实现“人不出户、事不出网”。浙江ODR平台现在已经迭代升级为“浙江解纷码”(线上矛盾中心)应用场景。

归纳而言,上述实践探索的积极经验体现为四个方面。首先是多元收集,畅通诉求渠道。除基层妇联干部在日常走访中搜集到的案件,还有来自诉源、警源和访源的案件。其次是优化流程,整合数据资源。根据应用开发V字模型,确定核心业务并对其进行拆解,形成任务流,实现了对同一数据源进行分层管理,分级应用;对不同数据源进行科学研判,深度整合。三是倒逼改革,实现制度重塑。数字化应用场景通过将工作任务流程化,明确事件的流转顺序和时限,实现闭环管理。同时,在适当的时机将应用场景的操作规范等成果制度化,倒逼机构改革。例如,《萧山区反家庭暴力联盟协作联动机制》已经由萧山区委政法委联动协同部门发文。四是重塑能力,实现组织变革。数字化改革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传统管理思维与技术赋能支撑间的关系问题。一方面,线上治理依赖于线下精细化治理的颗粒度,尤其是家庭矛盾的排查仍然离不开日常走访。另一方面,数字化促使妇联干部提升数字化能力和素质,具备塑造变革型组织的能力。

家庭治理数字化需破解的三大难题

当然,目前杭州的家庭治理数字化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还面临不少现实问题。特别是

受体制机制、公私边界以及治理理念等因素的制约,推进家庭治理数字化需要破解三大难题。

首先是数据共享与数据安全之间的统筹协调问题。信息的碎片化、条块化等问题给家庭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应用场景的开发要实现市、区、部门间互联互通,也要实现中枢、系统、平台、场景之间的互联互通。关于家庭领域应用场景的开发,最理想的状态就是所有的数据都通过家庭成员聚集。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激发数据要素对广大家庭追求高品质生活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叠加和倍增作用。数据安全既要遵守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上位法规定,也需进一步建立健全应用场景的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确保数据安全。

第二,公权介入和私权保障之间的边界划分问题。以何种方式介入、解决家庭矛盾,避免二次伤害,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是备受关注的问题。在家庭治理中,家庭结构相对容易把握,但是家庭关系的变化难以也不宜实时监测。数字化常用的技术手段,尤其是监控技术,无法在家庭领域实施。但技术在家庭治理领域仍然有用武之地,比如浙江ODR平台提供的7*24小时全天候智能咨询服务,既可以避免咨询者的尴尬心理,也有助于保护他们的隐私。

第三,社会治理与家庭服务之间的有效融合问题。妇联作为党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要有寓治理于服务的理念。家庭治理数字化建设应从服务端和治理端入手。服务端面向家庭,深入了解家庭需求,以服务为最终目标;治理端面向管理者,打通业务层级壁垒,充分发掘协同作用。现有的一些应用场景中,更多还是作为治理端存在。因此,群众端还需在后续应用场景的迭代升级中进行开发,用治理的精

细化实现服务的精准化,用妇联干部的服务指数换取广大家庭的幸福指数。

家庭治理数字化迭代升级的路径选择

任何现实难题的破解都是在创新实践中展开的,家庭治理数字化也不例外。基于上文的思考与分析,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推进家庭治理数字化迭代升级。

在价值取向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数字赋能与人文关怀相融合。形势在变化、目标在迭代、工具在升级,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妇联工作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应落在制度安排与治理实践之中,无论是数字化手段还是传统的日常走访,都是服务妇女和家庭的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因此,妇联组织应通过线上完善数字智治机制,推进“互联网+服务”建设;线下推进“四必访”(即生产经营遇到困难的企业女性必访,困难家庭必访,空巢老人及留守妇女儿童家庭必访,涉及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家庭必访),实现家庭相关需求调查与基层社情民意采集同步开展。

在顶层设计上,实现技术理性到制度理性的跨越。进一步明确反家暴应用场景的领域、事项、指标、协同关系和数据项等内容,制定系统集成清单和数据共享清单,绘制数据集成流程图和业务集成流程图。设置最小颗粒度的任务事项,形成指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这四个工作体系。同时,应用场景还要实现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和自下而上的应用场景创新相结合,实现技术与组织、制度的深度融合。

在指标设定上,实现基于算法模型的科学决策。数据要素只有通过算法、模型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才能创造价值。如何将家庭领域关键指标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组织架构之中,将基层社会治理的颗粒度精细化到家庭,是一个重大课题。对于发生家暴的家庭,尤其是存在高危风险的家庭,需要通过精准画像实现预警,助力科学决策。通过对既有高危家庭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合理设置一级指标,精细化设置二级指标,构建高危家庭预警模型。同时,在评价指标上,可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价、群众测评等方式,增加评价的效度和信度。

杭州市妇联系统积极推进家庭治理数字化建设,对构建“数据采集+需求分析+决策实施+评价反馈”的婚姻家庭纠纷预防化解系统进行了有效的探索,这是妇联立足主责主业、服务大局和服务家庭的新方式。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治理理念的加快变革以及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应用,家庭领域的数字化改革定会通过日益丰富的数字化要素供给不断迭代升级,实现精准治理和精准服务,回应广大家庭的急难愁盼和对美好生活的诉求。

(作者单位:浙江省妇女干部学校)

研究视窗

《女性创业者社会认知特征对初创企业绩效影响机理:基于SCT理论视角》

作者:解学梅 吴永慧 郜敏

近年来,随着女性创业力量的崛起,有关女性创业者的社会认知特征研究逐渐引起关注。基于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SCT),以女性创业者为研究对象,将创业自我效能、创业激情、坚毅和自我控制4种认知特征作为认知因素,机会识别作为行为因素,关系网络和性别歧视作为环境因素,构建了一个“认知—行为—环境”三元交互模型,系统探究女性创业者社会认知特征与初创企业绩效之间的复杂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女性创业者社会认知特征(创业自我效能、创业激情、坚毅、自我控制)对初创企业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机会识别在女性创业者社会认知特征和初创企业绩效关系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且关系网络和性别歧视两个环境因素调节该中介作用。本研究以女性创业者“社会认知特征—机会识别—初创企业绩效”为研究路径,探究女性创业者社会认知向行为转化并进一步影响初创企业绩效的内部机理,并且通过引入关系网络和性别歧视,拓展了环境因素作用于女性创业者社会认知和行动的路径。

来源:《系统管理学报》2022年第1期

《中国妇女权利发展100年:从强烈的政治担当到日臻完善的法律保障》

作者:柳华文

中国共产党成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揭开了中国妇女事业发展新的历史篇章。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实现男女平等、保障妇女权利方面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和政治担当。10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妇女地位在政治上和法律上得到根本改变,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克服了诸多困难,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不断推动依法治国的基础上日益形成了一整套全面保障妇女权利的法律保障体系。社会性别概念给中国法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中国的性别主流化进程不断深入。中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事业发展道路,持续加强中国妇女权利的法律保障,也不断为世界妇女发展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来源:《人权》2021年第5期

《中国家庭研究中的社会性别检视与反思》

作者:郑丹丹 杨祖丽

家庭研究与性别研究均逐渐被学界重视,二者在研究领域、研究视角乃至研究人员等方面均颇多相互渗透与影响。近年来,不少学者明确提出要将社会性别视角引入家庭研究。本文简要梳理家庭研究中国社会性别理论的发展脉络,检视近十年来中国家庭研究与社会性别议题有关的主要研究成果,并反思女性主义理论和多元交叉视角没能很好地融入中国家庭研究的原因。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中国家庭研究一方面揭示了当代女性面临的结构性制约,另一方面也强调了女性建构家庭关系的主体性。女性主义视角所强调的女性整体性认知和统一社会行动与中国文化的不吻合使得它难以在中国落地,多元交叉性理论在我国的家庭研究中正在萌芽且具备学术发展潜力,但具体的打开方式需要进一步探索。

来源:《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范语晨 整理)

观点秀场

虚实之间的浪漫想象:青年玩家在网络游戏中的交往

阅读提示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浪漫关系对当代青年已不是陌生的概念。而网络游戏情景下玩家的情感交往,往往依托虚拟空间的包容性与自主性而带有多样化的想象,其中既包含对现实婚恋情感话语的遵循,也带有对固有人际关系、性别角色的解构,并呈现出现代性下个人主义与传统观念交织的特征。本文将以一款F网游为例,讨论青年玩家如何在网络情景中实践他们的浪漫想象。

戴语珩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浪漫关系对当代青年已不再陌生。而在众多网络社交情景中,网络游戏,尤其是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缩写为MMORPG)则是别具特点的一类,这类游戏要求玩家扮演虚拟世界中的角色,进行游戏内的各种活动,为玩家提供了一个高度参与化、沉浸化的虚拟环境,从而产生出有别于其他网络平台的交友与恋爱体验。

网络游戏情景下玩家的情感交往,往往依托虚拟空间的包容性与自主性而带有多样化的想象,其中既包含对现实婚恋情感话语的遵循,也带有对固有人际关系、性别角色的解构,并且呈现出现代性下个人主义与传统观念交织的特征。本文将结合一款F网游,讨论青年玩家如何在网络情景中实践他们的浪漫想象。

浪漫想象的开启:陌生邂逅与情感维系

游戏内玩家的人际交往与浪漫邂逅的开启往往与游戏本身的设置与引导紧密相关。对于MMORPG类游戏而言,社交要素是其本质特征之一,游戏会通过设定战斗副本的合作需求、游戏内团队组织及其奖励、设计丰富的化身表情动作等方式鼓励陌生玩家之间的沟通与结识。

不论是在游戏相关平台中“寻亲交友”的招

募与投稿,还是直接建立于游戏内的公会、部队与聊天频道,“一起玩”都是游戏内交往的基础。相同或相似的玩法帮助原本陌生的个体之间建立起熟悉的关系,通过具体的游戏过程,亦能自然地呈现出各自的个性特征。许多玩家正是通过游戏内良好的合作体验(如攻略副本、前辈指导新人、共同参与社交活动等)而结识并建立友谊。同时,不仅有直接基于游戏内角色表情动作的互动,还有游戏外创作衍生漫画、视频等作品的交流,后者往往能引起玩家群体的广泛共鸣,也会成为玩家间表达情感的、十分有意义的“礼物”。

若要长期维系游戏内建立的情谊,则需要游戏外的社交媒介与游戏内容外的话题延伸。QQ群、YY语音频道等都是组织“团建”活动的重要平台。而从“通过游戏认识的朋友”转变为“普通意义的朋友”“亲密的人”时,交流的内容也会更多涉及个人日常生活中的遭遇与喜怒哀乐。这种交流的深入既是交往过程中自我披露与内容信息的拓展,也是将仅仅基于游戏内各类活动的合作、陪伴关系转化为更长久更亲密关系的重要途径。

基于游玩内容展开的结识,以及通过游戏内角色化身代替本人进行的一系列情感动作的表达,这种独立且模拟现实世界的虚拟游戏世界是其他泛社交交友平台难以复制的。这种更少暴露真人信息的模式,也更契合当前青年对于基于个性的、较为纯粹的友谊或恋爱关系的诉求。

流动中的CP概念:对全新友伴关系的探索

比起直白的寻找网恋对象,找人“处CP”可能是当前更为流行也更为“暧昧”的说法。在网络游戏的情景里,除了通常理解的“恋爱配对关系”之外,CP这一概念在具体的关系中被赋予了流动性、多样化的诠释。

为了将恋爱含义的CP与其他类型区分开来,产生了诸如“亲友CP”“绑定玩伴”“游戏内第一好”等拓展说法。同时,并非异性才能组CP,异性恋性取向的同性好友也会成为关系亲密的绑定玩伴,却又与通常的闺蜜等称呼有所区分。也不乏仅仅在游戏角色上维持的恋爱关系,如一对在游戏内以化身互相表达爱意的玩家,在游戏外则是纯粹的友谊关系。尤其对于将游戏化身视为个人“创造的作品角色”的玩家,这种CP关系脱离游戏情景后就蜕变为共同创作游戏故事的“合作者”或戏称“亲家”。CP关系这一概念在实际运用中存在的多样化解谈,使得CP关系不一定与恋爱挂等号,但另一方面,这常常仍是一种具有一对一性质的关系,与亲友、队友等身份不尽相同。

相比明确的网恋情侣或朋友身份,CP关系可以涉及恋爱,也可与其无关,重点在于建立关系的双方达成“一致”共识。正如笔者在游戏活跃的匿名主页上观察到的那样,当CP关系中的双方对这一概念的一致理解出现了偏差,或是随着时间推移一方产生了“越界”的想法,双方便会会对关系进行再定义或是终止。

当CP并非意味着恋爱对象或发展恋爱的潜在对象时,人们在那用、诠释其含义的过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对全新的友伴关系的探索,这种关系通过主体间的共识为基础进行定义,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吉登斯对亲密关系民主化的期望。

游戏内的性别角色:伴侣系统与婚礼过程

在性别互动论的视域下,个体总是在具体

的互动中实践性别、评估性别。具体到游戏的虚拟世界,则需要透过玩家对游戏化身的操作与表现,以及玩家参与游戏活动的言行,来探讨其背后对固有性别角色规范的遵从或反叛。

游戏内的婚礼系统是十分重要的观察性别互动的窗口。F游戏提供的伴侣系统有别于以往研究的案例,提供了更为自由和淡化性别角色身份的情景。参与婚礼的玩家双方其化身的性别与种族都没有限制,礼服与婚纱也能不限性别穿着,婚礼仪式中的“捧花”角色、坐骑驾驶者角色则以相对的左右位置进行确定;婚礼的过程从前期的预约时间、婚前仪式、典礼安排等都没有明显的性别角色分工,而只是强调了伴侣双方的共同在场——上述流程都需要玩家双方组队同时完成任务。

尽管结为伴侣的两人不一定有着实质的情侣关系,但有着实质亲密的、浪漫关系的二人依然会向往以婚礼仪式达成两人情感的纪念,这一点可从游戏内玩家自发设计礼堂、婚礼殿堂等场所以及开展婚礼活动而见。从这个角度来看,成为伴侣的婚礼仪式作为一段亲密关系的外部表现其重要价值依然存在。

当下,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急剧的社会变革,传统与现代亦以盘根错节的姿态贯穿着个体的私人生活与情感体验。当代青年既秉持着个人主义主导下的个体取向,关注自我成就,重视个人感受与个性的张扬,期望找到纯粹知心的友谊与浪漫爱情,又制约在传统异性婚恋规范及婚姻匹配市场的挑选下。在此背景下,无论男女,都感受着来自现实婚恋处境与理想中浪漫交往的矛盾。网络虚拟空间使得人们能够暂且逃离复杂矛盾的现实,提供给人们一个情感交流的实验舞台。青年玩家在虚拟游戏情景下如何处置他们在浪漫关系中的性别角色,他们对待爱、恋、友谊等感情的做法与态度,正是一个了解当代青年如何进行私人生活探索的窗口。作为网络原住民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其情感生活仍值得人们的进一步关注。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社会学学院)